

通化“二·三”暴乱 事件始末

李 大 根

目 录

通化“二·三”暴乱事件始末.....	李大根
前 言.....	(1)
一, “二·三”暴乱前的历史背景.....	(3)
(一) “九·三”光复后, 通化的形势.....	(3)
(二) 居留于通化的日本人概况.....	(4)
(三) 国民党韩人组织逆潮流而动.....	(7)
二, 蒋日伪相勾结的内幕.....	(8)
(一) 蒋日特频繁活动, 秘密结社, 组织暗杀团.....	(8)
(二) 国民党三个党部、三青团 两个工作团的反共活动.....	(15)
(三) 蒋特近藤晴雄与刘正修来通化的使命.....	(24)
(四) 有后台, 有勾结, 建立组织, 订立协议, 阴谋制造暴乱.....	(29)
三, 蒋日伪合流丑剧开台.....	(31)
(一) “武装暴动总指挥部”与暴动计划紧锣密鼓.....	(31)
(二) 导演一声断喝, 群丑粉墨登场.....	(37)
(三) 大年初一夜, 犹作黄梁梦.....	(40)
(四) 马失前蹄, 主将遭擒.....	(45)
四, 我军正义反击, 群丑相继落网.....	(52)
(一) 狼烟骤起, 孙耕尧伏诛.....	(52)
(二) 猖狂暴乱, 自投罗网.....	(56)

(三) 剩勇追穷寇，藤田实彦被捉.....	(63)
五、平定暴乱，处理善后	(70)
(一) 解除戒严，欢庆胜利.....	(70)
(二) 追悼烈士，表彰功臣.....	(75)
(三) 释放战俘，展览罪证.....	(77)
(四) 余音点滴，最后结局.....	(82)
后 记	(85)

前 言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二），在我国东北边陲城市——通化，发生一起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图谋“复兴”势力，伪满汉奸、军警相勾结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老百姓称之为“二·三”事件。

通化“二·三”暴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事先预谋的。

众所周知，“九·三”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巨大成果。胜利的果实，无疑应属于人民。由于美帝国主义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地位，干涉中国内政，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我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承认。他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全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为了达到其上述目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赞成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玩弄和平欺骗手段，为蒋介石进攻东北解放区争得时间。并于十二月二十日派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中国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马歇尔根据美蒋的“关外先行，然后把战火引向关内”的预定计划，主张东北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以便国民党军抢占东北。马歇尔来华第三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就开始运送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前来东北。这时，蒋介石已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李光忱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熊、李根据美、蒋的反革命旨意，指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违反德黑兰、柏林会议关于国际法处理法西斯的决定，公然勾结日本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等日军势力，收买汉奸、伪警宪、伪公安队，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二·三”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

这次暴乱事件的发生，破坏了“九·三”祖国光复后，通化山城和平民主的社会秩序，激起通化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慨，引起国内外人民的强烈谴责，使蒋介石勾结日伪独霸全中国的阴谋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使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大陆再谋“复兴”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在这反革命暴乱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辽东省通化省分委、安东省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通部队领导与地、市、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以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强大威力，将敌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镇压下去。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二·三”暴乱前的历史背景

(一) “九·三”光复后, 通化的形势

通化县位于吉林省的东南部, 民国时属奉天省(后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归东边道管辖。一九三七年日伪在此设立了通化省公署, 通化是首县。日伪为加紧城乡统治, 一九四一年于通化县城设立了通化市, 市县分署治理此地。至此, 通化已成为东边道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九·三”光复后, 市区人口达十四万三千七百余。民族有汉、满、回等, 还有侨居的日本人、韩人。由于地处我国东部边陲, 成了历代的军事要地。“八·一五”日寇投降前后, 外地流入人口骤增, 日伪军政人员尤为突出。特别是日本关东军携带伪满皇帝溥仪退守临江大栗子沟时, 曾集结某些武装力量, 妄图垂死挣扎, 后因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因此, 这些武装部队均流落于此。其中包括驻扎于通化四周的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军和随溥仪来的家眷、亲属和伪满各部大臣, 以及日本关东军“护送”部队与大量的伪宫内府人员。尤为甚者, 在伪满倒台时, 从新京(长春)、奉天(沈阳)方面疏散来大批伪官突及眷属, 还有由东边道各地涌入伪省城的日本关东军的残兵败将和从沈阳、长春、四平、北京、面安、重庆等地派遣来的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国民党的地下人员赵殿礼, 受辽宁省党部的派遣, 在通化公开了县党部, 并组建了一支保卫党部的自卫团。伪省长杨乃时, 奉蒋介石的广播命令, 在省署召集旧属人员成立了通化省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与此同时, 苏联红

军也进驻了通化。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人员罗衡、李剑云、姚黎平等，从七道沟铁矿组织了上千人的人民自卫武装。从冀热辽军区派来了军政干部，将伪通化省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解散，在苏军司令部允许下，建立了冀热辽吉林区通化专员公署，于通化建立了地区建国联合会。东北民主联军派来了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吴溉之为政委的保安部队，辽东省军区在此建立了以刘东元为司令的通化支队，还有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东北军政大学还在这里设立了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当时，中国共产党辽东省委及机关干部部分转移到通化，在通化相应地建立了辽东省通化省分委、通化地委、通化市、县委和市、县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如县大队等。

总之，通化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伴之以经济、文化能力及其社会基础。陆续麇集或集结于通化山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比较明显的势力，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发动劳苦大众、工农商学各界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通化。而国民党则与原日伪统治势力相勾结，反共反人民，妄图利用未解除武装的日本关东军的驻扎部队与伪警察、宪兵的军事力量，搞垮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等待蒋介石派中央军来接收。从而酝酿着两个阶级、两种力量在政治上的较量与军事上的冲突。这就是“二·三”暴乱前的历史背景。

（二）居留于通化的日本人概况

“八·一五”前，通化市内的日本人口，约有八千余人，绝大部分是官吏、军人、商人，劳动者次之。其中如清水、大林、大仓等二十八个株式会社，亦有几家医院、学校、妓院等。军事方面有山

本部队等约有三个师团驻守于通化。“八·一五”之后,其中上层人物多已逃亡朝鲜、长白山区一带。仍聚居于通化的还有三千余人。大部分军人为下级军官士兵,上级将校数量不多。这些军人,如知名的有军事指挥官安井少将。在“八·一五”之后,有的向当地人卖军马、枪支、军用品谋生的;有的怀有“复兴”复仇之心,将其武器弹药埋于地下,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九、十月间,通化附近日本居民身披麻袋片、洋灰袋纸,成群结队地逃亡到通化,因而,市内的日寇投降军、潜伏军、伪官吏等人员骤增。其中已被我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即达六千余人。从新京方面来的官吏,就有前满铁总裁木村卓一、伪宫内府次长荒井静雄、近卫处长大泽寅一、参议府参议高桥康顺、国务院参事官松山处吉等三百余名。到一九四五年底,通化的日本居民达五千八百五十八户,人口约一万六千余人,为原有日本居民人口的两倍。他们多是居于市内日人聚居的龙泉区。据当时户口统计,龙泉区有一千七百六十五户,五千六百三十余人;东昌区有三百七十四户,一千五百六十六人;中昌区有三百七十四户,三千五百九十四人;启通区有二百七十五户,九百二十七人;二道江区有二千零一十一户,四千九百三十五人。郊区有日本人、潜伏军甚多,未计其数。

“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有复兴野心的关东军司令部曾指示:“在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的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其力量。”因而退守南满,隐藏于通化附近山岳地带的日寇甚多。在通化、临江、濛江、长白、抚松一带,有以富永中将为为首的关东军约有三万余人;原于海龙、四平一带的日寇北支游击队(即富士部队),虽已大部被我解除武装,但仍有一部未解除武装的部队逃亡于通化山区。有以藤田实彦大佐为

首的日本关东军一二五师团残部，潜伏于老爷岭山脉南端的林子头附近，约有三千余人。此外，还有散兵游勇，散布于各地，无可计数。因此，无论通化市区、郊区、都成为日本人聚居的特殊之地。这与其它大城市有着地理条件上的不同差异，而形成独自特点，成为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场所。

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我军解放通化，建立了民主政府，为团结一致共建通化山城，成立了“通化各界建国联合会”（简称建联会），并为管理好在通化的日本侨民，于当年十一月七日，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将八·一五后成立的“日本居民会”，改为“通化日本人民代表部”，内选二十四人，担任代表、顾问、联络员、事务长、总务处长、厚生处长、产业处长等职务。并在日本人聚居的市内龙泉区、东昌区、中昌区、启通区、二道江区均设置分会，于分会内设户干班。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为了加强对日本人一切事务的管理，又将“通化日本人民代表部”改为“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简称日解联），内设支部长、秘书、事务、青年、组织、宣传、管理、情报、报导、供给、劳务、会计等机构，并于各区设办事处。

为了团结日本无产阶级，同年十二月一日，通化市政府发布文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已投降，但决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并号召“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设新东北”。文告中还同时阐明我民主政府的立场、态度、政策：“彻底肃清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挽救其劳苦大众，争取解放。对贫病者施以显厚之救济及医疗，创设医疗所，对其贫困患病者施以免费治疗，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

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等等。

我民主政府，严格执行政策，做到言行一致，取信于民。在战后非凡艰苦的岁月中，虽民主政府仅建立三个月，却尽力解决了日本贫民的职业，介绍其工作。对在我政府及其它部门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均予以优待。对贫困的日本居民给予了物质上的救济。据不完全统计，救济高粱米八千余斤，玉米面三万四千四百余斤，救济棉被六十六套，发放救济金十九万元，受救济者达一千七百二十余人，因此，受到大多数日本居民、下层阶级的拥护，在政治上逐渐倾向于我民主政府。然而日本法西斯残余及受蒙骗的部分日本人，受武士道精神流毒影响，或出于民族复仇心理，或抱有再度复兴之野心，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采取暗杀、爆炸、投毒、暴乱等毒辣阴谋手段，企图推翻我民主政府，企图在南满建立日本复兴的基地。

（三）国民党韩人组织逆潮流而动

解放前，通化的韩人仅有三千余人。其阶级成分极为复杂，特别是蒋、日、伪内部的韩人一时难以分辨，如金田、清木、吉野、吾本等人，以名字而言是日本人，而实际上则是韩人。特别是解放后，大批逃入通化的外地人中，亦有许多韩人成份。因此，通化“二·三”暴乱前，通化的韩人达到七千余人，为原有韩人的两倍多。韩人在通化的反动组织名目繁多，是极为复杂的。韩人中亦有日本法西斯的反动组织“大东亚联盟”，也有国民党特务在韩人中组织的“韩侨联合会”，在通化市、县境内及附近各县活动较为猖狂。他们以民主、解放、团结为借口，大肆宣传拥蒋反共，为国民

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鸣锣开道，散布流言蜚语，毒害居住通化的韩人。另有“重庆大韩临时政府代表部新京办事处”，也时常派特务来通化秘密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国民党由重庆派往长春的国民党特务罗金劳，四处串通，暗地勾结日、伪警宪内部的韩人，成立“朝鲜革命同志会”、“朝鲜满洲民族革命党”等反动组织。这些反动组织潜入通化大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皆标榜民族独立，而在暗地欢迎国民党中央军，并秘密组织“光复军”，瓦解在通化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向日姓韩人，特别是在妇女、老年人中进行反宣传，阻止韩人参加朝鲜义勇军。并煽动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家属，动员其在部队子女、丈夫、亲友脱队，投奔国民党中央军。同时韩人“新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姜昌济，为配合蒋介石勾结美帝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从而安派来朴阳春、刘德亮、吴健、洪锡勋、温良、朴永等六名，到达通化活动，瓦解朝鲜义勇军，进行反共宣传，调查韩人情况，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并参预蒋、日特务的暗杀、暴乱等反革命活动。这些韩人反动组织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多种渠道反共反人民的一个特种手段。

二、蒋日伪相勾结的内幕

（一）蒋日特频繁活动，秘密 结社，组织暗杀团

“八·一五”之后，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妄图二十年后日本在满洲再度复兴，千方百计潜伏于城市、山区各地。这些复兴分子欲达到再度复兴的目的，单靠自己力量是不可能的。正如奉天日本

特务头目池田中将自述：“为了日本再度复兴，我们就得依靠、利用国民党。”所以当时有许多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即复兴分子，更名换姓，或以难民为掩护，伪装潜入矿山、林区。许多重要战犯潜入了大城市，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并且还加入了国民党组织。

以通化为例，就有许多日本战犯伪装积极混入了“日解联通化支部”。如日本法西斯分子筱野破魔夫，混入“日解联”组织，窃居了支部长职务。日本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隐藏于石人沟，以难民身份潜入林子头炭坑工作；事后混入“日解联”进行阴谋活动，曾在日本居民大会上做讲演，并与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相勾结，加入国民党组织。类似情况到处可见。这些日本复兴分子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日本特务，又是国民党特务。如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的联络员近藤晴雄就是双料货。这些日本法西斯分子——复兴分子，在我解放区，表面上遵行民主政府法令，进行日本人民的事务性工作，实际上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在暗地容纳日本战犯；以保护日本人民财产安全等为借口，进行秘密结社，如“夜警班”、“猎枪会”、“十日会”，“大东亚联盟”等。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石原莞尔中将与松井石根大将所主持的“大东亚联盟”通化负责人千叶幸雄则混入了“通化日本居民管理委员会”窃居了救济员职务，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大肆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千叶幸雄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六日连续与新京（长春）派来的日特、蒋特分子长谷川相继会见密谈，事后派其部下小向，以救济日本难民为由，筹捐巨款做反革命活动经费。他们到处秘密联络，造谣惑众，推行日本复仇、复兴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则利用日本法西斯的复兴野心，奉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密令，从奉天、新京等地频繁地派出特务，勾结在通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复兴分子。他们为便

于联络，不易暴露目标，所派的国民党特务多为日本人，以卷烟为掩护，在通化日本人中进行特务活动。他们把“日解联”办公处，做为接头地点。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原伪通化省总参事官渡边勋，在“日解联”通化支部长筱野破魔夫办公室与新京国民党派来的花冈一夫为首的三名蒋特（其中一人为汉人，二人为日人）会面，三名特务是来通化联络地方国民党，同时了解日本人情况的。当渡边勋劝告说：“你们在这里乱走，恐怕危险。”花冈一夫回答说：“我们有非常重大的任务要联络。”听罢，渡边勋默默地点了点头。不久，原伪通化省公署经济科属官相川力会见一个从奉天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派来的日本人国民党特务分子，他自称是关东军冈村部队的人。当相川力问来者：“你来通化联络何事？”来者回答：“不便泄密。”说完把相川力浑身打量一番，随即追问：“七天以前从新京来了两名日本人，一名中国人，你是否知道？”相川力这才心有所悟，对来者说：“噢！原来是这样，有什么当我说吧。”当他们密谈之后，来者便去二道江联系国民党特务。

国民党特务与通化日寇复兴分子如此相勾结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渡边勋为倡导者，联合了在通化的日本法西斯的筱野派、相川派、水谷派为核心，以通化日解联支部长筱野破魔夫、伪桓仁县公署副县长桶口武俊、伪宫内府溥仪翻译官道满三郎、伪通化省公署建设股技师水谷英男、伪通化省公署经济科属官相川力为首成立了“国日特暗杀团”。他们以“日解联通化支部”为活动中心，在筱野破魔夫办公室或相川力住宅，先后秘密召开了九次会议，制定出暗杀团的行动纲领、计划、方案等。

①行动纲领：依靠国民党，利用日本人“八·一五”之后的

亡命主义，以保护日本人民的利益为借口，宣传日本二十年后再度复兴的野心，采取暗杀手段，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接收通化。渡边勋在密谋暗杀会议上曾讲道：“国民党很快就来通化，为了对国民党表示我们的忠诚，不杀是不行的”。并多次叫嚣：“无论如何要在国民党来通化之前办妥”。充分暴露出蒋、日特暗杀团的狰狞面目。

②行动组织及分工：

筱野派，有桶口、道满、福原、武藤、林田、泽山、千叶等；

相川派，有金高、高尾、加藤、西川、鹤谷等；

水谷派，有松村、木下、新村等。总计三十余人组成。

首领者：渡边勋、筱野破魔夫、相川力。

行动组织者：相川力、水谷英男。

行动计划者：渡边勋、道满三郎。

执行任务者：桶口武俊。

武器筹备者：宫本富士雄。

经费筹备者：筱野破魔夫。

③行动计划手段：其一是采取集中暗杀手段，暗杀对象是共产党通化党政军领导干部，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地点是在大光明剧场慰问演出大会时，乘共产党的党政军领导到会之机执行暗杀。其暗杀名单有中共辽东省通化省分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通化部队政委吴溉之、安东省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蒋亚泉，通化市、县长樊鹏飞、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行署公安处长刘甄霖，市公安局局长李剑云等八名。其二是采取分散暗杀手段，主要暗杀在我方工作的日本人。名单上列有：山田（此人是个两面派人物）、海志泽、内海勋、赤田山助等七人。

④行动后的退路：一旦行动败露，生存者即逃亡到奉天平安剧场疏开本部（日特本部）和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联络安排藏身之地。另有一途，可逃亡五道江、石人、磐石等地未解除武装的日本潜伏军内隐藏。

这股心狠手毒的蒋日特暗杀团，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之后，便施展其暗杀伎俩。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十二时，在“日解联”支部长室，筱野破魔夫法西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地向“日解联”训练班工作员藤田武男下达密令，定于一月一日夜暗杀内海勋。为什么要暗杀内海勋？因为他思想较为进步，在“日解联”做了许多工作，并能靠近八路军、民主政府，并为其担任翻译。筱野等人想从内海口中套取我方情报，而内海不肯透露。因此，被日本法西斯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更为恐惧内海的地方，就是怕内海探知蒋、日特的底细，向八路军告密。因而从他开刀，杀鸡给猴看，恐吓靠近民主政权的日本人。藤田武男接到暗杀命令之后，立即找来冈田、松田二人做帮手，密订行动路线与暗杀计划。藤田武男换身便服，冈田身穿华人服装，臂戴十字袖章，松田穿着航空服。三名凶手均带手枪，于一月一日（一九四六年元旦）下午三时许，在大光明剧场会齐。碰头之后，便分三路寻找内海勋。藤田武男去中昌区，冈田去东昌区，松田去龙泉区，均未找到内海而扑空。但凶手们不甘罢休，他们相继又潜回大光明剧场，约在下午七时许，终于发现了内海勋，便死死盯在内海勋后边。由于街上人多，未得便下手。当晚，内海勋先去中昌区水华园（日本妓馆），而后去山冈家，约于晚十时离开山冈家又返回水华园，三名凶手便埋伏于附近，候到二日凌晨三时，见内海勋走出水华园。当他孤身走到十字街口时，埋伏在松月（日本妓馆）门外暗处，距内海勋仅十五米处的藤

田武男，凶狠地开枪了，冈田、松田也随即开枪射击。毫无防备的内海勋，身中十弹，猝然倒地而亡。当民主政权的公安巡逻队闻声赶到现场时，凶手们早已逃之夭夭。

当时，日本法西斯，在通化的派别也在活动。当晚藤田实彦派的西川、佐藤，将内海勋在水华园活动的情报，暗中提供给阿部元。因西川、佐藤、内海勋均为我方工作人员山田的部下。所以西川，佐藤掌握内海勋活动的情报。阿部获悉情报后，通知赤川、梅山、樱井、福盛等人。他们便组织若干人，也赶到水华园吉田住宅，也去暗杀内海勋。但因未寻到踪迹而扑空。事发后，赤川冒功，说内海勋是赤川派所杀。当市公安局侦破暗杀案件时，他又恐惧万分，觅地藏身。据被捕后的渡边勋供认：“内海勋是原日本关东军山田部队参谋相川力派的外围组织者藤田武男、冈田、松田所杀。”相川力对此也供认不讳。赤川见案情真相大白，怕别人说他冒功，暗地派梅山，樱井、福盛等人去二道江，企图杀害“日解联”的山田。山田在内海勋出事后，非常恐惧，见赤川派的人一到，便投靠了赤川派，并泄露了我方情报。赤川得到情报后，又派人放火烧毁我二道江军火仓库，造成军火库爆炸事件，使我军遭到严重损失。

内海勋被暗杀之后，消息很快传遍通化山城，各界舆论纷纷。蒋、日特暗杀团及其凶手们十分恐惧。他们为了掩饰其罪恶，造谣惑众，嫁祸于人，说什么：内海勋是共党分子，被朝鲜义勇军所杀。谣言一出，引起了日本居民恐怖不安，不明真象的日本居民对我民主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对朝鲜义勇军非常仇恨。梅山良太郎将此情况向赤川做了报告，赤川听后，对暗杀内海勋事件没有波及到赤川派，却落到了共产党的头上西沾沾自喜。

我民主政府对内海勋被杀事件十分关注，组织力量认真调查、

侦缉。经我公安机关侦察所获证据，证明暗杀内海勋事件，确属国民党，日本特务策划的，暗杀组织是以日本战犯为核心，披着“日解联”合法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特意制造恐怖事件。对此，我民主政府在向日本居民揭露真象的同时，采取了果断措施，下令解散了“日解联通化支部”，决定通化日本居民的一切事务，均由“通化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并根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敌情，决定逮捕战犯，用中日两种文字印刷了大量宣传单，在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召开日本居民会议上散发，组织座谈会讨论，使日本居民明确了我军逮捕战犯的意义和目的。

一月十日，我专署发布了逮捕日本战犯的文告。再次阐明我民主政府的立场、态度、政策。具体提出如下三点：第一、战争罪犯与法西斯分子，自己要亲到民主政府登记、自首，民主政府给以从轻处理。仍执迷不悟或匿居或逃亡，逮捕后罪加一等。要知道战争罪犯不论逃到何处，都要遭到逮捕惩办的。第二、主张和平的日本居留人民，要公开和秘密检举报告战争罪犯行止，若有故意匿藏战争罪犯者，应受民主政府法令制裁。第三、凡一切日本居留人民，藏有任何武器弹药与军用品，要自动交到民主政府去，否则民主政府予以法律制裁。

通过宣传教育，许多日本贫苦居留人民有了觉悟，积极向我民主政府检举揭发了部分隐藏的日本战犯，体现出中日人民对日寇法西斯的无比痛恨。

经发布文告，又同日本居民座谈之后，便开始了逮捕行动。这项工作，由我公安侦察员王晓峰同志和山田等十余名日本工作人员去执行。经过数日机智勇敢的奋战，不畏日寇战犯的顽抗，逮捕了中尉级以上的日本法西斯战犯，共计一百二十余名，其中有暗杀团倡